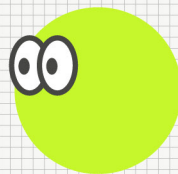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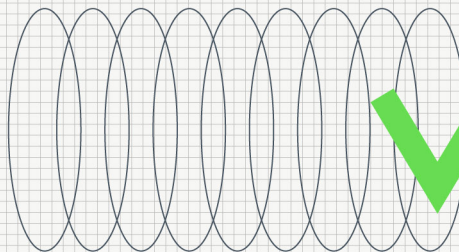


# 人類學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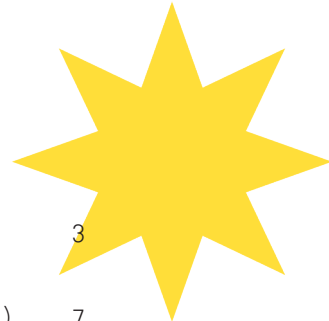


ANTHROPOLOGY VISION



NO.31

# 《人類學視界》No. 31



## 序

再多做一點點：共創一個友善參與、協力工作的學會 / 郭佩宜

3

## 青年學者的時光膠囊

There and Back Again: Studying Global Imaginaries between Tanzania and Taiwan / 謝力登 (Derek Sheridan)

7

人類學博士沒告訴你的事 / 歐子綺

16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and Indigenous Ecologies: A Self-Introduction / 高進榮 (Brendan A. Galipeau)

20

珍視的暫且放下，往前走：「新的」田野與「新來的」田野工作者 / 何浩慈

26

Becoming 一位吃喝玩樂的人類學家 / 鄭肇祺

32

## 玩創人類學

「卡到人類學」：透過卡牌遊戲，理解人類學的田野倫理情境 / 謝竹雯

37

## 社群記 / 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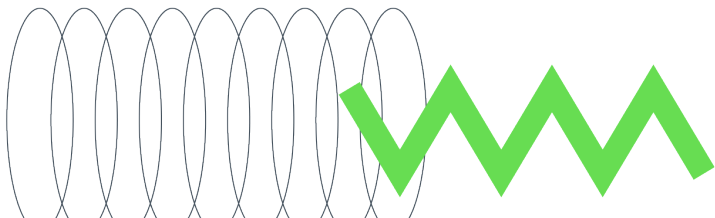
好奇且易感的文化追尋者：胡台麗教授追思會側記 / 鄭瑋寧

45

## 獎助訊息

2022 年第五屆「李亦園先生紀念獎學金」得獎名單

50



發行人：郭佩宜

發行單位：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本期主編：鄭瑋寧

文字編輯：謝竹雯

封面設計與版面構成：林穎珪

出版時間：2022.11

## 再多做一點點： 共創一個友善參與、協力工作的學會

郭佩宜 | 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第 31 屆理事長

猶記得菜鳥時，曾「旁聽」學會的年度會員大會，那次會議討論了改名的重大議題，除了「台灣」與「中國」的身分認同之外，也涉及了「人類學」與「民族學」的學術差異。各方折衝的結果，大會決議將「中國民族學會」改名為「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彼時為 2005 年，感覺學會是長輩們的組織，會員人數不多，距離自己很遙遠，沒什麼興趣加入。殊不知幾年後因緣際會，進入學會的祕書處擔任祕書，與幾位同仁一起籌劃研討會型態的年會、並將學會通訊轉型為《人類學視界》（2007～），我才開始認識在內政部人民團體法規範下的學會組織運作，思考建制化學術社群存在的意義與功能，以及限制。

當時有一群熱心的青年學者貢獻文章給《人類學視界》，開始集體的科普寫作，並在 2009 年某次籌劃稿件的聚會中，有感於半年一期、學會內部刊物的紙本《人類學視界》還不足以達成強化台灣人類學與社會的連結、以及同儕之間交流合作的目標，決定另外成立「芭樂人類學」部落格，以每週一篇文章的更新頻率與社會對話。

隨著世代交替，我們這輩的人類學者也開始陸續當選學會理事，共同參與了台灣人類學界的雙軌發展——在正式的學會組織內建言與服務，同時在體制外透過芭樂人類學等平台書寫實踐。2021 年下旬上任的這一屆（第 31 屆）理事會相當年輕，幾乎都是多年來在不同路徑積極參與的活力學者。

猶記得剛到學會工作時，理監事會多半在中研院活動中心的中餐廳 VIP 室舉行，在座都是資深長輩，學會事務不多，比較不像是個會議，而是在大圓桌上吃飯，聆聽前輩們交談。十年後的現在，理事會樣貌截然不同，「沒有大人」，青壯世代的同儕們在 google meet 討論會務，輕鬆愉快。

人類學界轉變了，學會轉變了，我們的角色也轉變了。學會在多年來的奠基之下，運作良好，我們除了守成之外，還能再多做點什麼？

或許我們可以在幾個方向上再多做一點點，以接近社群共好的理想。例如年會是建立「社群感」的好方式，學術研究的發表與討論是主軸，但我們可以藉由這聚會促進更多交流的可能、創造更多一同想像的空間，也讓初來乍到的朋友覺得有趣且歡迎參與。因此近年除了傳統 panel 場次，也開放自組論壇形式的討論。2022 年「人類學好南」年會於中山大學西灣學院舉行，這次年會更設計了新書發表短講、以及實驗 open space 的非正式場次，歡迎大家把剛冒出芽的新課題不吝拋出、現場嘗試揪團。

學術社群內部不同單位間需要更多的交流，學會可作為平台，促進橫向連結，創造合作以及資源共享的可能。我們已於 2022 年 8 月底邀請學會的團體會員單位代表聚會，尤其針對人才培育的合作交換意見。另一方面，跨世代的傳承與參與對學術社群也很重要，這幾年有不少前輩學者退休，更讓我們意識到學會可加強承先啟後的工作。我們兵分兩路，一方面啟動台灣人類學史口述歷史計畫，邀請青年學者訪談自己的老師輩學者，或進行跨世代對話，透過他們的眼睛，從不同視角切入，回顧台灣人類學多元繽紛的發展歷程，共同建構學史。另一方面則邀請新進的青年學者書寫自己的研究，讓社群成員彼此認識，也呈現新興的研究課題、以及新生代對台灣人類學的不同想像及展望。

《人類學視界》作為學會的通訊刊物，將以前述工作為新的策劃重點，除人類學界的讀者之外，相信也是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有興趣的記錄。另一方面，學會的活動以及精采的文章，也須透過數位傳播，社群媒體的經營也是一項重要工作。

同時間，台灣與世界的連結也是作為社群代表的學會需持續耕耘的向度。除了延續過去幾年與日本文化人類學會的交流，我們也更積極參與世界人類學的組織，包括參與相關 COVID-19 的研究分享活動、及推薦台灣主要人類學研究期刊的論文至世界人類學的平台發表。在烏克蘭遭受俄羅斯軍事入侵後，全球人類學組織紛紛發文聲援，我們也快速響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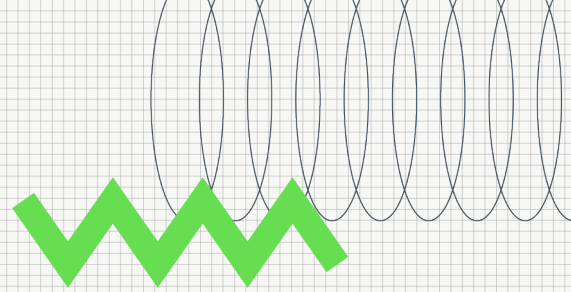
無論是年會的籌劃、國內人類學相關系所交流平台的建立、台灣人類學史的傳承與匯整、青年世代的培育及參與、數位媒介的經營和延展、或國際學術社群連結的強化，事務繁多，需要大家一起承擔。本屆秘書處

擴大編制，除負責統籌的秘書長（趙恩潔）之外，新增四位副秘書長，分別負責國際交流（林育生）、歷史傳承（劉子愷）、青年參與（謝竹雯）以及數位世界（李梅君），而《人類學視界》則由鄭瑋寧擔任主編，負責改版的重任。感謝秘書處夥伴們的熱情付出，以及理監事們的協力，還有義務訪談與撰稿、以及慷慨受訪分享的學界前輩與朋友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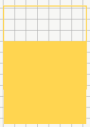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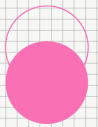
回想當初，曾經以為學會距離自己很遙遠，希望現在的人類學老師與學生們已有不同的感受。學會是為大家服務的組織，也是個大家一起工作的團體，讓我們共同建構一個跨世代協力、友善而開放的人類學社群。



2022年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年會開幕論壇  
（照片提供：年會工作團隊）



## 青年學者的時光膠囊



# There and Back Again: Studying Global Imaginaries between Tanzania and Taiwan

謝力登 |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研究員

## 在台灣研究《美利堅治世》和政治主體性

我的研究路程好像從陳雲林 2008 年首次拜訪台灣才算是「正式」開始。我當時正好住在台灣，此次經驗挑戰（或至少複雜化）我對「美國帝國」的批判立場，尤其是在美國侵略伊拉克之後。當陳雲林來訪的時候，一位抗議者跟我宣稱馬英九是故意地選在美國舉行大選日子，才邀請對岸人士來台訪問，這是為了引開美國的注意力。給我更深的印象的是於美國在臺協會舊址外牆上一個標誌，禁止政治示威遊行（至少在門口前面）。這個標誌看似理所當然地預設美國是台灣人示威遊行的對象。

這些經驗對照我在芝加哥大學最後一年，John Kelly 教授 -- 也是一位人類學家 -- 開設了一堂關於「美利

堅治世」的課程。Kelly 教授認為對美國權力的「反帝國主義」批評忽略了去殖民化、自決、及美國支持基於「敞開大門、有限權利、有限責任」為前提的民族國家體系之間的親密關係。換句話說，對美帝國的批判不能只是對「外國干涉」的批判，而是對以不平等的相互依存和不平等的權利及義務為前提的世界秩序，做更廣泛的批判。

我的台灣研究起點可說是緣起於我想要從事關於美國帝國的人類學研究。我選擇布朗大學人類學就讀博士，是因 Catherine Lutz 曾鼓勵人類學家開始進行關於「帝國的細節」（*empire in the details*）的民族誌田野調查；她也曾與反對美國全球軍事基地的跨國社會運動有所連結。然而在台灣，反對美國帝國的假設，在將中國也視為一個帝國的情況下變得複雜化。不過，



我不滿意「中國也是類似帝國」、台灣只是「帝國之間」的說法，我也不滿意台灣人只是將美國帝國主體性「內化」的立場。相反地，我逐漸發現「反美」和「反中」兩派政治主體性之間的「本體論不一致」(ontological incongruence)可能意味著地緣政治、反帝國想像和政治主體性之間的關係有著更深層的問題。的確，我可以說，渴望理論調和不同政治本體論的矛盾，以及積極去辨別政治上「朋友」和「敵人」的猶豫是我的研究動機之一。

我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碩士班的第一個研究計劃是針對冷戰時代美國在台灣的存在歷史民族誌。我特別想要研究美國軍事基地和台灣社會之間的日常關係，因為我原先期待這是美國「帝國主權」和台灣「當地主權」之間如何調和的場域。結果，我研究的主題演變成是在台灣戒嚴時期之下，美國外交人士、軍事人士和平民如何跟台灣異議人士互動，美國人如何理解他們在台灣日常生活時，與本土人士截然不同的權利，以及台灣異議人士如何招引美國人去協助他們的政治行動。

雖然我很快就中斷了這份歷史民族誌計劃，不過我最終被介紹到北美台灣研究協會和中研院臺史所合作支持的研究計劃，主要收集冷戰時美國人類學家在台灣進行「中國人類學」民族誌的口述歷史。我參與訪問老師以及主編輯工作。

我在台灣進行碩士研究的時候，我訪問過一位小時候在美國軍事基地工作的台灣人。他碰巧是現在參與支持台灣變成美國第五十一州運動的成員。這個相遇導致我轉向我碩士班的第二個研究計劃：臺獨行動者以及以本土社團為名的大帳篷下的台灣基層社團。從2008年觀察年輕一輩的野草莓運動如何跟他們上一輩的運動人士保持距離開始，我對他們感到好奇。我開始採用「政治化」的架構來研究。我曾經想要瞭解人如何被「政治化」，又如何開始參與不同種的「政治計劃」？個人生活軌跡（以及其被揭示的社會脈絡）又和個人如何「進入政治」有什麼關係？有趣的是，我後來研究中國到非洲的移民，也採用類似的架構：在中國移民者生活軌跡中，非洲如何變成可想像的移民目標？困擾我的是更深層廣泛的問題，也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主體性」：不同的人如何變成居住於不同且互斥的



意識形態世界。當然，在台灣，不同的人不只是居住於不同且互斥意識形態世界，也居住在不同想像國家。但是，我對身份認同的問題不太感到興趣，反而對本體論的政治建構感到興趣。我特別對於本土社團人士的「危機感」和將力氣花在「經濟」（尤其是兩岸的經濟）而不是「政治」的主流感性之間的情感鴻溝，深感興趣。

雖然我在 2012 年與本土社團只有進行兩個月的田野調查，卻感覺當時收集的民族誌的材料比我在坦尚尼亞進行中商田野調查的前六個月還要更多。一方面，與去非洲發展的中國人相比，臺獨行動者比較樂意跟一位來自美國的學者溝通。他們經常提醒我美國對台灣的情況有「責任」。另一方面，我收集的資料可發揮的空間比我碩士論文更大。回歸美國帝國主題以及思考台灣平民政府的案例，我最後書寫關於臺獨社團如何想像、闡釋和接觸美國帝國的概念。我認為它涉及『在美國帝國主體性』還要更加複雜的認識論。

於是，我開始書寫第二章關於我的對話者如何想像「政治」。但是，後來發生兩件事情導致我沒有完成。第一是我改變博士論文的主題。第二是太陽花運動。我

的博士研究計劃本來是將我的主題範圍從年長臺獨行動者擴大到包括年輕社會運動者。我進行碩士研究時，我的對話者懷疑年輕人是否可以動員，儘管反媒體壟斷運動出現。不到兩年的時間，太陽花運動出現了。然而，在那個時候，我已經開始了不同的博士研究主題。我那從未發表的「民族誌」文章已經變成「歷史」，馬政府的去政治化以及新自由主義時代之下的「做政治」的意義也已經變成「歷史」。當前局勢大為不同，世界的「經濟」已經變成被「（地緣）政治化」的範疇。



## 在坦尚尼亞研究世界化中國和政治經濟的關係性

在布朗大學讀博士的第一年，我有次在課堂中演講，談論關於美國曾經對台灣援助、「中美合作」所帶來的文化影響。其中一位來自坦尚尼亞的同學，也是我後來的好友 Mohamed Yunus Rafiq，跟我分享，因為中國也曾經（以現在所謂南南合作之名）援助坦尚尼亞，可能也留下類似的影響。他跟我講他小時候曾經看過中國大使館散佈斯瓦西里語版的中國民間故事和武術手冊。他甚至說中國文化可能已經變成坦尚尼亞「存在方式 (way of being)」的一部分，比如說，他在坦尚尼亞的偏遠村莊見過男生鍛煉武術。但是，他也提到當代坦尚尼亞面對來自中國的商業移民導致爭議。據說，在坦尚尼亞的印巴人非常尊重經濟邊界，但是，中國人不顧既有框架，十分願意進入坦尚尼亞各個層面的經濟市場，其中甚至包括「賣花生」。我後來到當地田野時，發現其實已經沒有中國人真的在賣花生，但是這個小故事說明坦尚尼亞社會如何看中國人挑戰當地既有貿易中所隱藏的種族等級。



剛取得碩士學位的時候，我曾經考慮過用研究中國在非洲的存在為題目申請博士。因為對我來說，這個題目是延伸於我本來研究冷戰時美國在台灣存在的研究。但是，因為我當時缺乏非洲研究的背景，我的指導老師建議我不要這樣申請。當我已經「安全地」開始讀博士，我這位同學的分享與評論重新點燃我的好奇心。雖然我對離開台灣研究感到有些猶豫，但是前往不同的大陸這項挑戰讓我感到新奇且興奮。幸運的是，指導教授和（更重要的是）亡妻當時都非常熱烈地表達支持。社會科學研究會 (SSRC) 也願意支援我在「非洲移民中的流動性、賦權和不穩定 (Mobility, Empowerment, and Precarity in African Migration)」主題研究群下發展論文，並補助我獎學金。

從台灣研究移動到中非研究不只是改變田野地點，也是從一群學者的脈絡移動到另外一群學者的脈絡。對我而言，參與會議、工作坊以及跟 LISTSERV 辯論也變成一種田野調查的活動，因為我有機會去觀察一個領域的學者如何設計一場「研究領域」以及建構其認識論規範和共識。於是，我開始將我的研究計劃概念化為「日常知識生產的民族誌」，尤其是我參與的學術界如何概念化「中非關係」的方式，和一般中國人和非洲人如何通過自己的經驗和人際關係將「中非關係」概念化有所不同。比如說，很多中非學者主要的目標是通過實證研究擔任神話終結者（mythbusters）（實際上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我後來採用上述「賣花生」的故事寫了一篇論文，來闡明「中非神話」在日常對話的複雜角色以及跟學術界對話的互動。

2013年，我先在烏干達和坦尚尼亞進行探索性的田野之後，才決定在坦尚尼亞進行長期民族誌田野（2014年至2016年）。一開始，我研究中非關係的理論動機就如同我研究美台關係的理論動機一樣：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

但是，我在非洲田野調查時接觸的中國人多半是小型移民企業家和在批發商店打工的年輕人，他們之中有的人認為他們自己是一般的「移民者」。而且我越透過「移民」、「跨國」和「華僑」等學術文學看非洲的中國人，我就越對「中國在非洲的帝國主義」的論述，感到跟現實的隔閡，特別是因這類話語論述經常非歷史學地將中國人視與白人定居者一樣。我說的是中非研究中正在形成的「共識」，但是，我對這種論點也感到不滿意。當代中國人移民到非洲不只是「全球化」而已，以及全球化已經有帝國結構的背景。有的在非洲的中國人士生活條件，的確很類似於在非洲殖民後的歐美外籍人士，同時，仍有其他在非洲的中國人士經驗比較接近印度海長期以來的「亞洲中間商」，例如在非洲的印巴人或在東南亞的華人。但是，由於今天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不一樣，所以出現了一個悖論。中國移民在非洲經驗是，儘管有所謂中國在非洲的崛起，在非洲生活以及工作的中國人經常表達他們時常感到脆弱：尤其是面對非洲當地官員如何找他們麻煩時的脆弱，面對當地“罪犯”時的脆弱，甚至是經濟脆弱（來非洲發展通常是因為移民者

感到沒辦法在中國發展，非洲機會更多)。與此同時，中國人在非洲的經濟權力跟非洲本地人相比，還是稍微強大。但是，我看中國人在非洲寫的博客(Blog)，以及開始進行田野調查之後，發現中國人認為他們在非洲的社會地位，比所謂美國帝國公民的我還「低」。比如說，在非洲有好幾次有中國人請我給他們看我的美國護照，因為他們聽說護照上有寫一句：「您無論在哪裡，美國永遠是您的堅強後盾」。我開始思考我的研究主題是中國和非洲之間關係中特權和脆弱性的模糊性。在一篇文章中，我述說了以上的護照故事和中國人跟當地官員的互動，來分析「帝國」的話語如何涉及全球公民權利和倫理的問題。他們之間的關係顯然是不對稱的，但是經濟等級跟政治等級並不同構。在坦尚尼亞的中國人會爭論他們的地位，包括對坦尚尼亞人(還有對彼此)的權利和義務。

在田野的時候，我住在中國人開的旅館、跟來坦尚尼亞「市場考察」的客人交流、跟中國人和坦尚尼亞人批發貿易者交流、採訪中國人開的商業公司，在春節晚會表演舞蹈、幫人建造超市以及陪同採礦探勘。這些經驗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是，不少中國移民者對當地環境缺乏安全感和信任

(但是對在非洲賺錢的機會非常樂觀)。我開始注意中非關係下的人際信任的問題，導致我思考如何瞭解其關係的品質。如果中國和坦尚尼亞之間的關係，用官方話語來說，是「友誼」，完全不同於世界對北南的不平等關係，這種期待如何轉化為中國在坦尚尼亞外籍人士和一般坦尚尼亞人日常上的互動。區分什麼是「好」關係，什麼是「壞」關係，什麼是「鬥爭」，什麼是「合作」，這些分類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實用。我觀察的關係事實上是更複雜，更有矛盾性。友善關係和非友善關係都有其張力、悖論和矛盾。批評「黑人」或「Wachina(中國人)」的人有時同時跟坦尚尼亞人或中國人保有溫柔友善的關係。然而，中國人和坦尚尼亞人仍然經常彼此需要；他們之間有不同、不平等、不同構的相互依存。即使他們之間沒有信任，為了個人計劃仍然需要合作。儘管如此，作為一個來自美國的人類學家，我是「雙重外人」。跟中國人和坦尚尼亞人同時進行田野，經常像是在不同的世界之間穿梭。我開始將我的中國和坦尚尼亞對話者視為「存在關係中」(being-in-relation)，然而他們不一定分享人際關係(being in relationships)。除了關注人際關係之外，我也開始思考「競爭」和「不平等」的關係性的倫理以及政治意義；比如，有些中國人說可以去

非洲發展，因為他們想像非洲還不發達，這對中國移民和一般非洲人發展關係又有什麼意義，對分工體系有什麼意義？這些問題在我的研究有重要性是因為坦尚尼亞人和中國人都重視關係的道德－經濟重要性，但是，他們對誰該幫助誰，以及如何對待他者，有著不同期待。



這是為什麼使我開始對關係性和倫理有興趣。我想要將關於非洲－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辯論分析視為「關係性倫理」的辯論。中國移民者和一般坦尚尼亞人，事實上也已經在進行這種分析。我在寫論文的時候，我透過關於1989年後中國知識歷史的課程接觸到趙汀陽和他所謂「天下」理論。對我來說，有趣的不是「天下」是否代表所謂國際關係的「中國模式」，反而將趙所謂的「方法論關係主義」和「非排他」視為批判分析事實非洲－中國關係的倫理。儘管如此，趙對關係倫理的假設，尤其是期待獲得禮物接收者自然表現的「感恩」，反映在非洲被複雜化的「中國人」期待。但是，「中國」和「非洲」對道德經濟表面上有不同態度，這種論述很容易表現文化種族歧視。我觀察中國移民者會抱怨「非洲人沒有感恩」的話語，跟關於所謂「依賴性倫理」的西方對非洲的理論化，共享有平行但相同問題意識。這種論述的“反非”潛伏需要批判和反思。

我想要進一步從事的是再中心化非洲－中國關係中的政治經濟，這不是為了「矯正」文化分析，而是作為「道德反思」的對象，揭示在不平等的全球經濟中，人們對彼此欠債的不同假設，這是一個在南南關係中必須重新思考的老問題。我試圖說明中國移民和非洲人共同的生存情況，儘管他們有不同的談論方式。這是為什麼我寫過關於打招呼如何揭示人與人之間相互關心的倫理的文章。我最感興趣不是中國人是否真的如此打招呼，而是對於打招呼的評論揭示了中國人和坦尚尼亞人如何看待他們的社會關係。在我的書中，我想要提出的論點是，中國移民者和坦尚尼亞人變成相互依存以及評價這個關係是否實現南南合作理想，可以視為關於相互依存本性和治理的道德辯論。

## 功夫歷史和回台灣

我在坦尚尼亞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本來讓我來坦尚尼亞作田野的同學剛好在附近寫論文。他每天午休時會去空手道道場練習。而剛好此道場的師傅也是拍武術電影的導演。他們來找我幫忙招募中國人去參與他們的影片製作。我也因此開始跟道場合作。我對道場本來是由中國軍事教官開始的說法很感興趣，但是他們為什麼要教坦尚尼亞人空手道？我認為，早期中國存在的痕跡已經被本土化。我因此申請布朗大學人類學系的獎學金，於2016年回坦尚尼亞跟道場師傅們一起去他的老鄉尚島，收集有關當地武術發展的口述歷史。我們發現原本來此地教武術的並不是中國的軍事教官，反而來自北韓。無論如此，問題仍存在：為什麼要教空手道？此外，道場師傅聲稱他能跟精靈溝通，

以及是祂們教他「功夫的真實歷史」：韓國人、中國人和日本人帶來非洲教的武術，最初是跟隨先知來到非洲。

我在 2018 年來到中研院民族所。於 2019 年申請台灣科技部的研究計劃去研究東亞武術在東非的歷史，為了從歷史想像的角度來研究亞非文化交流。但是，計劃因疫情和家人生病而被拖延，我到今年才有機會正式開始執行這項計劃。

就如同我前面所舉的例子，對東亞武術起源的想像意味著所謂「一帶一路」不只是中國政府主導的政治經濟計畫，也反映一種關於印度洋浪漫的歷史空間想像。台灣歷史的地緣政治脈絡也引發了不同的世界想像，但是台灣還有跟印度洋的歷史關係，我去年跟中研院其他單位進行關於台灣經濟外交合作的研究計劃，我本身也開始一個關於台

灣和非洲之間關係的研究計劃。這是為了跟中國在非洲的跨國性相比，也是為了研究台灣人如何在國外「推廣」台灣。台灣人想像自己居住於什麼樣的世界？最後，我認為我的研究中的兩條主線，將來很可能會重新組合在一起。

英文版請見 (an English version can be found here)

<https://reurl.cc/9pY00a>





# 人類學博士沒告訴你的事

歐子綺 |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在我的時光膠囊裡，存著幾個人生岔路口的光影。決定的當下，往往不知道眼前的道路，通向何方？終點又是什麼模樣？今天能有幸以青年人類學者的身份留下紀錄，得先打開 2010 年的時光膠囊...

## 讀人類學博士班其實是偶然

2009 年我從清華社會所畢業，理所當然地準備申請社會學博士班。一邊尋找著申請校系的資料，一邊感受到人類學的召喚：人類學老師們的研究看起來好奇妙啊，從千奇百怪的現象裡、掏洗出十分抽象的問題。我的碩士論文結尾，也嘗試探問與自由的可能性。又想起碩士論文口試的時候，我唯一一位人類學口試委員給我的建議是最有吸引力的。那個我想像中的人類學，像是一條若隱若現的線，把這些揪心困惑、靈光乍現的片刻，都串了起來。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高等教育仍在震盪之中。我申請了八間社會學和七間人類學博士班，最後選擇獎學金較為充裕的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就讀。開學前的暑假，收到博士班一年級必修課「人類學理論與問題」的課程大綱。指定閱讀有涂爾幹、韋伯、馬克思，也有佛洛伊德、傅柯、德希達，就是沒有幾個我認識的人類學家。第一堂課結束，來自世界各地的十二位同學都嚇傻了，大家面面相覷。接下來，同學們一起在聽不懂還要裝懂的狀態下，逐漸建立起革命情感 [1]。那些抽象理論和談話太美，像是在清晨的迷霧森林之中漫步，看不到盡頭，也不想走出來。

## 身心健康是最重要的田野能力

於是乎，我在博士班幾乎零田野訓練的情況下，回到了熟悉又陌生的北京。我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是從

碩士論文延伸而來。好處是已經有穩固的田野人脈和網絡基礎，壞處是失去了「發現新大陸」的衝勁。雖然我來到了一個新的城中村，但是顯而易見的研究主題似乎在碩論中都碰觸過了。博士論文田野調查的頭幾個月，我刻意放大感官神經，從早到晚都處於緊繃狀態，深怕漏掉任何新的線索：深夜鄰居的爭吵內容、清晨街道清掃的時間點、腳踏車的煞車聲…。很快地，不僅輕微失眠，也有點精神耗弱。我嘗試打坐，幫自己按下暫停鍵。也從田野小夥伴的四人宿舍裡搬出去，找了一間單人房給自己一些 me time。

### 找工作可能比你想的更辛苦

經過八年的博士班生活，我逐漸嫻熟美國東北部的人類學理論，也完成博士論文——學術工作的敲門磚，回到了台灣。這是我第一次正式踏入台灣的人類學界，興奮而又忐忑不安。雖然回到了母語的世界，一切卻熟悉而陌生。那些抽象的英文理論轉換成中文，格外地彳亍拗口。在失語的尋職之路，我寫下的字，必須一個個吞回去，經過好幾重迴路，再一個個吐出來。

我格外幸運，在兩年博後期間得到六次求職演講的機會。儘管在美國經歷過面試，也陪著同學、學長姐練習模擬演講。但真的等到自己拿到入場券的時候，才發現準備遠遠不足。第一場演講時我剛生完第二個孩子，一邊坐月子、一邊修改手邊剛發表完的研討會論文，就上場了。第二場和第三場演講，兩個單位安排在同一天進行招聘。我以同一篇發展中的研討會論文為基底，但感到越來越難招架老師們犀利的提問 [2]。隔年，新的面試機會來臨時，我扎扎实實地打掉重練。回頭認真面對博士論文，想出新的架構，老老實實地說故事。

儘管盡力了，還是沒有得到任何工作機會。我發現回到台灣找工作最困難的地方，是語言的轉換。這個語言不是英文或中文的問題，而是大家關心的內容、論證的方法不大相同。有一段時間像是鬼打牆一樣，我不知道大家要的是什麼。於是我開始揣摩如何轉譯，台灣人類學圈的語彙、知識興趣、對話對象。漸漸地，我不知道怎麼把我最在意的研究問題與成果，用我的方式呈現給大家。一旦戴上了質疑自己「不夠人類學」（或是，不夠像大家想要的人類學）的緊箍咒，便走向矯枉過正，在揣摩與迎合中失去了自己。



從北京城中村看咫尺外的高樓

### 博士論文是一個堡壘

在找工作最低潮的時刻，我去見了碩士時期的導師，跟他說我求職以來的困惑與掙扎。他徐徐回答：「博士論文是一個堡壘，走出來要花很多年。等你把博士論文轉化成發表、累積作品，之後慢慢放下來，就會開展出不同的題目。」那瞬間我才意識到，過去博士班漫長的訓練，讓我蓋了一個堅固的堡壘。我在自己構築的世界裡，訴說我自己的關懷。堡壘越築越高，我看不見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怎麼邀請外面的人走進來。

第六次演講，很幸運地，我找到了現在的工作，成了跨領域學院裡的人類學者。如果要說之前幾次的嘗試是枉然，那倒也不是。如果沒有一連串的揣摩、試錯與對話，我沒有辦法從堡壘裡找到一條路，慢慢走出來，用自己的方式說話。

### 人類學教的是戀愛密技？

求職時經歷的語言轉換，在跨領域的學院教人類學時，又經歷了一次。第一次教人類學課程的時候，我已經努力把閱讀份量降低，讓授課看起來比較生活化，但是課程架構仍是以美國的人類學教科書、人類學科的理論和發展為主。我還記得第二堂下課，一群愁眉苦臉的大一學生把我團團圍住。他們讀 30 頁馬林諾夫斯基的原典，花了一整週的時間，叫苦連天。後來我一路刪減英文經典閱讀的份量，盡量控制在五到十頁的經典閱讀，讓非人類學本科的學生以及國際學生能夠有基礎訓練、也保有學習興趣。

過去兩年，我收到最有趣的教學回饋意見是：人類學幫他們成功談戀愛！甜美的泰國學生說，修人類學讓她在這次的異國戀情裡得心應手。直率的韓國學生也跟我說，人類

學課程讓她在曖昧時期充分運用觀察方法和深描對象的各種行為與意義，最後兩人順利在一起。學生們發現人類學幫助他們了解自我和「異文化」的差異，也練習從當地人的觀點，去理解曖昧對象的行為以及和他們溝通。

### 你，就是人類學

回首來時路，似乎是在不少偶然與挫折下，走到了現在。直到今天，我仍常常懷疑：我真的是一個人類學家嗎？人類學家應該是什麼樣子？想起博士班最後一年的某次師生會談，大家爭論起哥大人類系應該要有的定位與走向。記憶中，當時的系主任是這麼回答的：「我們不去定義人類學是什麼，因為一旦你定義了它，也就框限了它。」這讓我有些明白，為什麼在讀人類學的過程中，學了很多看似無關的理論。因為每一次的對話和選擇，都是在幫助我去釐清，我的人類學是什麼。

—

[1] 關於是否該就讀博士班、博士班期間的學術訓練、資格考準備，請參閱拙作。歐子綺，2013。〈走學術，不堅定，又如何？〉，《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20期。

[2] 感謝師友們的提問，當時演講的內容在多次修改後已經正式出版。Tzu-Chi Ou, 2021. "Spaces of Suspension: Construction, Demolition, and Extension in a Beijing Migrant Neighbourhood." *Pacific Affairs* 94, no. 2 (June 1, 2021): 251 - 64. <https://doi.org/10.5509/2021942251>.



時時面臨拆遷的出租房



學會騎三輪車的我和田野利器流動書攤

#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and Indigenous Ecologies: A Self-Introduction

Brendan A. Galipeau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Greetings to the anthropology community in Taiwan. Having arrived here three years ago I welcome this opportunity to briefly introduce myself as part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wider community.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Growing up in a liberal arts Waldorf education system and regularly visiting the Sierra Nevada Mountains every summer for family trips, my interest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cultures and countries was cultivated from an early age. I have been engaged in study,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Taiwa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a variety of capacities for the past fourteen years since 2007 when I first visited northern Thailand and Southwest China for a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field studies program. I then returned in 2008 to work for an

NGO in village community-base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ibetan areas in China upon completing my undergraduate degree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Each of my subsequent degrees were then built upon these initial experiences. I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in Applied Anthropology in 2012 based upon research on the social impacts of hydropower resettlement on local agriculture among Tibetan commun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Based upon findings made during this project about local agriculture, economies, history, and landscape, my subsequent doctoral research then focused on colonial histories and global capitalist agriculture related to viticulture and wine production in Northwest Yunnan, leading to a PhD degree in Anthropology in 2017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I am an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ist by training and having lived and studied in Hawai'i, I also became quite deeply versed in histories of colonialism and indigeneity, working closely with a Native Hawaiian anthropologist Ty Tengan and several others with research projects spread throughout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Austronesia. This makes living and working in Taiwan particularly exciting and enriching for me today. As an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ist focused on indigenous peoples, climate change,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and food, my work is guided by two questions which I see as carrying both scholarly and applie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hat are the roles of culture broadly speaking (religion, ethnicity, identity, history, etc.) in shaping people's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surrounding natural environments and ecology?

How do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balance the nee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Are these two things mutually exclusive?

My past research interests and publications focus on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history in Tibetan Southwest China. I have studied and written about hydropower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nd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and am currently at work on a book manuscript under contrac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tentatively titled *Crafting a Tibetan Terroir: Wine Production, Identity, and Landscape Change in Shangri-La, China*. This work explores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of ethnicit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as they relate to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commodification of wine and grape production among Tibetans in Northwest Yunnan Province in Southwest China. The book provides an inquiry into the ways that a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French notion of *terroir* or "taste of place," can work to create and formulate new forms of ethno-regional identities and village landscapes among wine producers, built around their production of wine as a commodity from a certain marketed locale. I ask and examine how colonial histories and global capitalism can be re-established and reformulated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Tibetan" branded wine and beer in the crafting of a new global and unique

wine region and industry? In the book I assert that in post-socialist and post semi-colonial locales, long standing historical patterns of global capitalism and exchange of stimulants and intoxicants, remain in continuous motion with colonial and other older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 being reestablished and reformulated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Tibetan wine and beer.

Following the completion of my PhD degree in 2017, I was awarded a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in Transnational Asian Studies at Rice University for two years from 2017 to 2019, before being selected for and hired for my current position a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addition to teaching courses on environment, food,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China, and Asian Studies more broadly, given my expertise and familiarity with Southeast Asia as a border region with Yunnan and shared cultural affinities with Southwest China, my teaching at NTHU includes regular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coursework on Southeast Asia.



Last year I was awarded a research grant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a new research project based in Taiwan entitled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Salmon Worlds in East Asia: Foreign Aqua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hina and Conservation of an Indigenous Fish in Taiwan. This new research takes an ethnographic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studies approach to understand how different knowledge systems (indigenous and western scientific) play out in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imals, ecosystems, and climate cha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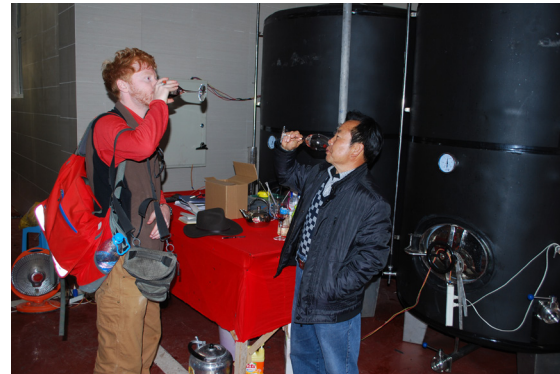


The project examines salmon conservation among indigenous Atayal peoples, national park managers, and conservation scientists in Taiwan, where the Formosan Landlocked Salmon (*Oncorhynchus masouformosanus*) once a major food source for the Atayal is now faced with possible extinction. The fish has become a national symbol of conservation in Taiwan, and serves as a bellwether for climate change. This is an issue with wide-ranging significance and particular impacts upo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Asia-Pacific. The fish became landlocked not

because it cannot reach the ocean physically, but rather as temperatures warmed after the last ice age, preventing it from returning to the ocean as downstream sections of rivers became too warm for it to live. Today as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oceeds, the fish has become further threatened with extinction due to habitats shrinking with warming rivers and increasing severity of typhoon events. The project focuses on and highlights historical and ethnographic analyses of indigenous Atayal perspectives regarding the fish, viewed as a disappearing ancestor in local practice and belief. In this work, I proceed by acknowledging the notion in recent scholarship that perhaps the only way forward in a period of rapid human induce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s through the notion of a more-than-human anthrop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listening to non-humans in the ecosystems surrounding us. There are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non-human animal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se relationships reveals new and important gap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However, industrialization, colonialism, and urbanization are slowly eroding these relationships and alienating people from

the wild forests and rivers around them. Historically, Atayal people maintained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Landlocked Salmon as a food source, acknowledging it as an ancestor that could share details with them about its riverine habitats. This research thus works to highlight what forms of agency have historically been ascribed to the fish and related aquatic river species and animals by indigenous peoples. In parts thanks to a Japanese colonial scientist, Ōshima Masamitsu who first “discovered” the Landlocked Salmon, we know that historically Atayal people maintained deep relationships with the fish through not only consumption but also songs, stories, and other folk customs. Ōshima’s work is recognized by Atayal themselves as leaving behind one of the last written or living memories of times when their people maintained active relations with the fish as a food source and ancestor before its population decline and move towards extinction.

In this research I am working on weaving together these histories with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among the Atayal o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about this aquatic ancestor, as this indigenous group has become more directly involved in habitat restoration, monitoring, and fish recovery, hoping to strengthen and bring back the relations they once maintained with the fish.



Theoretically I don't like to tie myself down to one rigid body of scholarship or area. My book manuscript is really a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ecology engaged with history and studies of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 For my new work in Taiwan, I am drawn towards multispecies approaches, indigenous studies, and what I should like to call grounded STS, couched in empirical data. I find som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to be a bit too esoteric and lacking in real world specificity. Much of my previous and current work draws great inspiration from Anna Tsing's and more recently Michael Hathaway's new book on the matsutake mushrooms as another valuable commodity produced by Tibetans in Northwest Yunnan. I find these authors' melding of ideas of capitalism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with multispecies ideals to be of particular intrigue and useful to think with.

I have so far found life and work in Taiwan to be incredibly rewarding and particularly appreciate the small and intimate but very global anthropological community here. As mentioned before, the building out and growing strengths in indigenous studies and connections with Oceania ar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and excitement to me having lived and studied in Hawai'i. I carry a particular excitement to continue to build my work around this area of scholarship and with local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round the island.



## 珍視的暫且放下，往前走： 「新的」田野與「新來的」田野工作者

何浩慈 |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博士論文研究雖是學術社群成員最珍視的資產，也是未來發展重要基礎，但若欲以學術為長遠志業，完成論文、拿到學位下一步，恐怕便需放下長期投注之心血與熟悉產生的安全感，啟程新研究。對既有田野的羈絆與回饋責任是人類學學徒一輩子的事，但亦須繼續往前走，方能回應體制內研究者不斷創新以受認可的期待。這是筆者尚為學界新鮮人的淺見。

思考前行方向時，體認到開闢新天地雖是壓力，亦為重拾塵封記憶中嚮往研究之契機。筆者在大學時代開始接觸臺灣原住民與世界南島語族知識，有幸師從學養深厚並與部落建立情感連結的教授，雖僅學得皮毛，但深受啟發。碩士班時期一心以此為研究目標，尤其關注發展計畫、公共建設造成之文化與環境後果、文化資產保存、身分認同、傳統生態知識當代應用、以及社會正義等議題。然而，

生命之流往往充滿創意，難以事前預料。後來數年求學生涯被引領至其他領域探索，直至即將進入博士後研究階段，回首發現，曲折征途往往是為必要之成長與更美的風景鋪路。

兜兜轉轉，重獲回到出發地的機會，回望大學、碩士時對原民研究之追尋，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以往乃基於了解不深而生的好奇與浪漫想像，後來持續關心，則源自想理解「差異」：「差異」比乍看之下小？比原本以為大？是阻力還是助力？人類社會如何在此基礎上存續？細緻卻涵容地看待、回應小至個體經驗、想法、行為，大至種族、族群、國籍、文化、階級、世代、城鄉、性別、宗教、黨派、年齡等分類範疇之間的「差異」，是人類學核心命題之一，也是專業所在。隨著嶄新旅程推展，自身因經驗累積萌生新分析視角，變遷中的政治環境與社會價值觀，也在眼前折射出新世界。

1980年代肇始、近十來年愈發蓬勃的原運、原權、轉型正義、正名、去污名、語言文化復振思潮，與原民社群內部主體性意識提高相輔相成，呈現泛族群認同、以部落／區域／流域為主體、以家族為本等多元觀點。同時，帶動外部社會以田野工作者與部落平等、互惠、溝通、合作關係，取代以往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觀察者與被觀察者框架隱含之上下位階。留意研究過程牽涉之權力關係、消費、剝削、殖民遺緒已是田野工作者基本守則，研究倫理審查機制也從要求取得個人知情同意，進一步強調取得部落會議集體諮商同意。研究實踐上固然有許多挑戰待解，但也持續反思改善。

完成香港都市民族誌研究並取得博士學位後，筆者跟隨國立臺東大學團隊，於臺東縣以排灣族為主要人口之聚落，以「新來的」（不具備長期、深入在地研究或生活經驗）田野工作者身分，探索「新的」（筆者未接觸過的）田野。人類學徒雖慣於旅行與適應新環境，但一頭栽進陌生研究領域，仍萬事起頭難。進入新田野首先面臨「正當性」挑戰：無族群身分；無法用族語溝通、無法用族語溝通與理解其中文化深意；對部落生活模式、社會關係、文化慣習、歷史脈絡不熟悉，連日常言行、應對都得從頭學習。種種「劣勢」

引發諸多提醒、質疑，除了來自他人，也來自自己。儘管謹言慎行、以不造成傷害與避免「利用」等情事為最高指導原則，也秉持必要時遵照族人意願中斷研究、不再打擾的心態，仍可能因知識、經驗不足而犯錯。就部落立場而言，對外來者建立信任需經歷長時間觀察、篩選、磨合。一切從挫折中學習，因此更感謝在跌跌撞撞摸索、偶爾造成困擾過程中，仍善意接納、慷慨協助、耐心包容的溫暖。這些支持都是將研究堅持下去的力量，也是不會忘記的恩情。



一個天空晴朗、空氣沉滯的午後，部落農人家中前院曬著紅藜，長輩在躺椅上小憩，我在一旁聽她分享人生故事。  
拍攝：林季威。

烈日下之生活百態構成此番田野重要片段，於實踐過程體會生活中的文化、文化中的生活。七月某一日，因工作事忙、雜事纏身，腦中縈繞剪不斷理還亂的思緒，午前特別厭世疲懶。下午回到部落，大熱天，貓狗躺在地上放空，枝頭樹葉也紋風不動，只在焚風偶爾吹過時抖動身體。來到經常造訪的店鋪，已熟識的老闆娘看到我略為驚訝，說：「我剛好剛開店，妳就來了！」不是第一次有這種巧合，我說：「對啊，我們好有緣。」她笑盈盈點頭稱是，頭上戴著一頂優雅草帽。我說要買些小點，稍後與部落青年開會討論時分享。老闆娘一邊張羅食物，一邊拿出親手鮮榨的冰鎮紅龍果汁，請我喝。大受感動之餘，也覺得不好意思。然而，感動不只如此。

喝到手工紅龍果汁一週前，受邀參加山另一側一位 kina（排灣語，指稱上一輩女性長輩）家的烤肉聚會。由於種種陰錯陽差，我抵達時已散場，只剩幾位常見到的家庭成員輕聲談笑，享受喧囂後的寧靜。見我終於風塵僕僕趕

到，由於很熟識了，眾人就我的姍姍來遲開玩笑地嗆幾句，但隨即起身熱食物、準備飲料，還臨時追加涼拌小菜和甜點。一家人明明已酒足飯飽，應收拾下山，早些休息預備明日工作，卻圍在桌邊陪我吃飯，要我多吃一點、吃慢一點。我頓時像游子回到家，被家人相聚的溫馨幸福包圍。

進入田野後，下一道關卡是確立研究題目。此時，我已不再有博士生階段隔絕庶務人事紛擾、全職與全身心浸泡田野中的奢侈，但理解到，欲尋獲田野地地方感及田野工作者身體感，仍須回歸田野、找回初心。

時值二月冬末初春，把握機會隨部落成員入夜上山，感受人與山林之緊密互動。置身彷彿與世隔絕的密林，伴隨踏破落葉枯枝都響徹雲霄的厚重靜謐，感受到的不是恐懼與寒冷，而是令人難以承受、近乎鼻酸的溫暖、平靜、安適。叢林充滿野性，肉眼不可及，但知曉純粹、直白的黑

暗中充滿陌生動植物氣息。周遭如此沉靜，好多事卻正發生著，眾多生靈在呼吸躍動，被包圍著的人類渺小卻安全，我竟感到格外有生命力，脈搏漸趨平緩，平日被生活抽乾的精力重新補滿，變得更像「人」。

以博班研究為基礎，輔以新田野中一段時日的學習，筆者終於將研究問題設定為：從人地互動論述，包括部落成員如何認知自身與山川、土地、河流關係，理解在地觀點之理想生活方式。希望藉此開展由博班環境人類學研究衍生之療癒、幸福感、福祉、精神健康、多元醫療、情緒、情感議題，回應當前將生活品質、生命意義納入考量的「永續發展」範式。

經過幾場「通過儀式」般的經驗洗禮，像配備了全新視野，雖與往常無異，持續參與部落生活各面向，但對於所見所聞之感知、詮釋已不同以往。曾有機會向考古學教授請教：「為什麼有照片，還得手繪紀錄出土物件？」教授說明，透過人重新描繪和突顯特徵，比照片更能顯示出物件重點與特殊性。社會／文化人類學家撰寫民族誌時也類似，並非平鋪直敘紀錄故事，而是將資訊輸入腦中，以理論基礎對比田野工作者經驗，再分析、檢視資料，進而將

其以具理論意義之形式輸出。至此，故事不再只是個人化、僅關乎小眾之軼事，而是紀錄世界圖像的文本。民族誌、手繪動植物圖樣、考古物件，皆成為認識外在世界之窗口。



初抵台東頭幾日，參與部落收穫祭，台九線大雨滂沱後出現一道完整彩虹。



距初抵臺東 15 個月後，整理資料時翻出上方照片，紀錄了開啟博士後研究階段的第一個任務：與田野夥伴共同經歷大雨中的收穫祭，部落成員齊心協力完成祭典，撤場時大武鄉段海岸線天空出現了彩虹。見到照片，回顧一年多田野及行政工作，反思最初想法、預設，深感明白了越多，越覺知之甚少。田野歷程與其說是為提問找答案，更像是不斷修正提出的問題。

兩年後，「新的」田野熟了一點，「新來的」田野工作者也成長了一點，此時筆者卻需暫別，轉往其他城市展開教學工作。身分轉換後再訪，竟有又變回「新來的」的忐忑。長期田野調查過程中，有許多看似目標發散、無謂堅持、徒勞無功的時刻，直到忐忑心情被部落成員「歡迎回來」的親切反應化解，才豁然開朗。或許細火慢燉下終能較為得體地應對進退、或許犯過的錯被寬容了、或許心意被看見並接納了，那些不帶目的、不問值不值得的腳步突然有了意義。即便偶爾遭遇禮貌卻疏離的距離，也明白，田野工作者的成長之路包含修好自己的玻璃心，尊重他人有拒絕權利。

所謂融入田野，不同研究者各有做法與原則，或許最終沒有一體適用的規範。在「新的」田野待了三年，筆者自認仍處於學習階段（或許學習永遠沒有終點）。摸索至今，發覺當下田野脈絡中，最適合自己的方式不盡然為人類學「成為在地人」的經典追求，而是讓田野工作者的存在不使田野夥伴感到不自在，甚至能談心分享、聊理想與渴望、聊失落與遺憾。不追求「成為在地人」，出於兩個個人原因：一方面，「在地人」彼此間特質相異、各有故事，哪一種才是標準呢？另一方面，試著變得「一樣」時發現，裝是裝不來的，反而警扭、使人不知如何相處。融入不一定指變得一樣，在尊重當地脈絡前提下，維持自己的樣子，或許不同、甚至突兀，卻反而自然、有趣、甚至互補。於是理解，做田野和過日子並無二致，平常怎麼待人處事，在田野如此便好。不強迫自己，也不強迫別人，與焦慮和得失心和解，踏實生活、建立關係。越珍視的，越要捨得放手。



身在田野中，便放下焦慮和得失心，真正去生活、建立關係。

回到課堂上與學生分享這一段珍貴田野旅程，常提到要把人（包括自己及他人）當人看。意思是，認知並接納生而為人有太多限制，不可能完全不受情緒影響、不可能毫無立場完全中立、不可能沒有思考框架地全然將心比心、不可能永遠不傷害別人或被傷害，即便都是無心。「人類學就在研究人類啊！」聽來或許外行、武斷，但人類如此複雜、豐富、精密，創造出諸多樣態殊異的社會、文化、現象，充滿無法被透徹理解的神秘故事，難道不是引人入勝的研究課題？對筆者而言，田野竟不只是學術研究，還是生而為人、來到世上體驗生命，終其一生面對的功課：不斷自我覺察，調整與外在互動模式，再從經驗中重新雕琢自我，塑造對所處環境之認知。最終，不只了解外在世界，也了解自身。唯有如此，生命和學術之路才能持續走下去。

# Becoming 一位吃喝玩樂的人類學家

鄭肇祺 | 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副教授

實不相瞞，我是靠「吃吃喝喝」拿到人類學博士學位。

從碩士班到博士班，我的研究都脫離不了吃和喝：從健康的香港本地有機蔬菜、美味的酬神燒豬，到力圖進入國際市場的養殖水產，都是我的論文研究範圍。報導人說，只要有可以吃的機會，艾力克 (Eric) 的雷達就會讓他自動出現。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這種能力，反正我眾多的田野紀錄中，飲食場合佔了大部份。我也曾自詡為跟嘉義縣前縣長小花一樣，勤跑紅帖的人 (田野媽媽不鼓勵我去跑白帖)，我們都很認真地試吃各道佳餚，肚子一天比一天立體。

「吃吃喝喝」可能有點誇張，但請想想，一場研討會最讓人能留下記憶的是晚宴和便當，一個超市或農夫市集沒有讓人試吃就沒有買氣。作為研究生的我的生存策略就是出席各大小學術活動，盡心盡力聽完精彩 (!) 的演講，

期待拿著免費 finger food，一邊努力交際。沒有這個美食雷達，或許我就欠缺田野訪談技巧的磨練機會，我就不會從生活中體驗農漁村的社會日常。從「吃吃喝喝」演化為探索「吃喝玩樂」文化的人類學家，我的五感開始被報導人寄予厚望：如何把商品精緻化、開拓市場需求，成為我現在的主要田野提問，也磨練出我的研究及教學工具。

過去我的研究集中在有機農業社群及生活態度的實踐過程，筆耕多於實際耕作，但報導人對我有所期望，紀錄香港碩果僅存的農業活動成為我的使命。在出國求學期間，我決定要先轉換田野場地及研究範圍，從貿易、永續的角度，討論台灣的養殖漁業。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我逐漸掌握到治理 (governance) 和政治生態學 (political ecology) 的文獻對話核心，也在後期開始接觸身體感、科技與社會 (STS) 和後人類主義 (posthumanism)，因此對多物種民族誌、水產科學、市場等產生興趣。方法論上，我

仍然重視社區形成和轉變過程，也著重多點民族誌，盡量接觸到產業鏈上的各種利害關係人。透過非人的視野，我開始和物（動物、植物、微生物，甚至死物）進行學術對話（我也很想在生活上和他們一直聊天）。近來我的思考都是透過物（我稱之為 Thinking Through Things）理解農漁產品供應鏈上的大小事。

此刻的我是一位在臺東工作的教師，研究的是美食學、產業鏈及永續觀光。以上都是邊吃邊喝邊發展出來的研究題目。貪吃的我盡量別錯過台東慢食節，也不會放過在地別具特色的無菜單料理。跟原住民部落夥伴共學共作，不離把「吃喝玩樂」跟文化傳承接軌的思考及嘗試，同時反思基礎和應用研究的共存可能。我會協助串連美食網絡，同時到訪消費端，探索各種商品的形成、進場與退場。產業鏈的研究是難以停留在個別社區，我的 walking（借用 Tim Ingold 的詞彙）是產業道路、農田、魚塢、農夫市場、超市、菜市場，甚至加工處理場、小店及超市，一進去產業鏈，我的五感就自動打開了，從氣味、溫度、濕度到味道，就連手起刀落的動作，都是我的田野資料。



我與報導魚 tilapia (aka 吳郭魚 aka 金山鯛  
aka 羅非魚 aka 台灣鯛)

我也把這些研究經驗帶進教學。學生上我的課是蠻累的，因為隨時隨地都是學習機會。我特別喜歡跟學生一起到訪社區，動手作、動嘴吃，「吃下去的知識才是屬於你的」，這是我開設的各種文化課程的精神。我們經歷過各種人、物和事，在河溪、海洋、農田、廚房，甚至我的家，認識植物、動物和微生物。雖然現在我不能安排多少份課前讀物，但把學生引領到 Sidney Mintz 的《甜與權力》，就得請他們帶一份甜品來上課分享；要認識阿美族「海洋就是我家的冰箱」，我們就去豐濱鄉吃無菜單料理；要了解橄欖產業的興衰，我們就坐小發財車到橄欖園野餐。



和敬愛的香港農友一起飲茶吃點心

人類學理論對我來說變得更實在了。不論是政治生態學中權力與行為的關係，社會不公義的再生產與抵抗，還是後人類主義中對多物種互動的欣賞與分析，我都在學習把它們內化為研究和教學的 DNA（套用各種大學社會實踐的話語，雖然我仍然相信這是文化建構的一部份）。現在的我在進行全球水產供應鏈的研究及書寫，就不能脫離人類學各種經典概念及新近議題。光是在北美的超市或網購中選擇一尾從台灣進口的虱目魚，裡面牽涉的就包括國際貿易、食物安全、健康、公眾衛生、口感風味、族群或國家認同，以及冷鏈技術。全貌觀是永恆不落伍的民族誌之道，談何容易、體現更難，卻是值得堅持的人類學之道。



田野中拿起攝影機的 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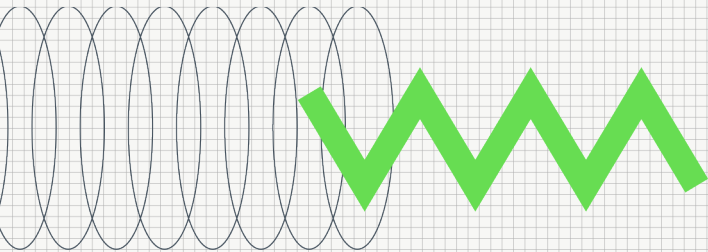
學術研究書籍要繼續寫，但科普文章和非虛構寫作是更具效果的呈現。最近讀到《鰻漫回家路》及《偽魚販指南》，都不是出自人類學家之筆，卻有深刻的民族誌描寫取向。作者一位是瑞典記者，另一位是台灣賣魚販，都透過魚的生命史，把家庭、情感、地方知識等交織起來，作為說故事的人，他們把草根日常娓娓道出，教讀者愛不釋手。我期願自己學生雖不是傳統人類學系所出身，但在跨領域、多實作的學習環境下，找出感動別人而資訊量豐富的表達方式，緊緊貼近著日常，同時展現出宏觀視野。

應用人類學成為我結合研究、教學和實務工作的重要基礎。最近我開始賣起花鰻來，是屬於一個與部落漁民合作的過程。錢沒有經過我手，但我在過程中成為了偽小資本家（pseudo petty capitalist），在訂定商業策略上直接參與，並發展出冷鏈，把活魚送給數十公里外的法式餐廳。親身投入在商業世界，使我把過去的研究（小農經濟、冷鏈、美食學、小資本家、本地飲食文化、小旅行）共治一爐，並把有意投身相同事業的在地居民和學生納入「事業版圖」。從一個「騙吃騙喝」的學生，到拓展美食網絡的學者，理論已不再是書本裡的知識，而是我遊走在學術、教學、商業、社區及文化傳承之間的「指南」。

因為還有二十多年才能退休（誤），我總是得找到支持著一直享受人類學工作的事情。這一年來，我試著去「照顧」一塊小農田。我不敢說在種東西，比較像是去拔草，騰出一些空間，讓地方居民會吃的野菜長出來。拿著手機，打開 iNaturalist APP，我走進公民科學的前沿。我也嘗試認識魚塢的水下微生物世界，買一台顯微鏡作為田野工具，同時品嚐含有杜莎藻的鹽花，學習從風味論述及實踐中看市場。在家門前，種了一些部落分享的台灣藜，見證牠們長到三米半高，或是結出鮮豔奪目的穗時的非人美學。我也跟獵人學習漁獵智慧，雖未拿起槍，但從沖洗、分食、料理中，重新認識山林。總也少不了下水吧。在綠島，我和學生潛進海洋，感受水壓帶來的身體感，學習成為負責任的海洋公民，同時思考 wet ontology（濕的本體論）的現實。過著往返田野與研究室、山林與海洋、產地與市場、微觀與鉅觀的人生，應該足於讓我持續研究、出版、教學、應用，直到退隱魚塢，專心養殖報導「魚」們，期待魚蝦豐收成為學術成果的一刻。



# 玩創人類學





# 「卡到人類學」： 透過卡牌遊戲，理解人類學的田野倫理情境

謝竹雯 feat. 卡到人類學中譯計劃小組（謝竹雯、陳玉莘、卓浩右、鄭建文）

對人類學家和許多以人為對象的研究者們來說，「不造成傷害」是人類學研究倫理的核心價值與共識，研究倫理的審查與訓練已然成為必須通過的成年禮。然而實際田野走一遭的人類學家，也深知琅琅上口的 Do No Harm，往往沒那麼簡單，需要放入脈絡來思考。

那麼可不可能透過「遊戲」帶入情境，在歡笑之餘，刺激思考和討論人類學家進入田野地乃至書寫民族誌所遭遇的倫理困境及相關倫理議題？

「卡到人類學」正是一款「希望能夠提供各式各樣人類學家可能面對的困境與難題，讓玩家嘗試思考在這些難以應付的情況下，『你怎麼辦』？」的卡牌遊戲。本文將介紹卡牌遊戲「卡到人類學」傳入台灣的翻譯與使用過程。

## 契機

「卡到人類學」卡牌遊戲的翻譯與引介，緣起自一次我與在教學現場奮戰的陳玉莘老師於社交軟體上有關「如何將人類學知識轉換成為大學課堂上可以吸收的知識」的對話。以研究生教學助理身分帶過大學部課程約五年的跌宕經驗，我打從心底同感這種致力於刺激學生學習的盼望。除了將書本上有時略顯深難的概念和理論消化後加上例子點綴笑話反哺餵給學生之外，不同於投影片、講義、期刊文章和教科書的花式課堂活動，已經是課堂設計不容忽視的一部分了。當時最先浮現在腦海的就是 Cards Against Anthropology 這套卡牌遊戲。

我與這套卡牌遊戲的第一次接觸，是在博班二年級擔任 Anthropology 101 教學助理的時候，當時的領課教授 Anna Agbe-Davies 提議，在助教課時段 (recitation) 使用 Cards Against Anthropology 搭配指定閱讀文章和學習單，在炒熱課堂氣氛的同時又能帶出田野倫理的相關討論。而後經過數次美國課堂的實驗證明，大學生的確「愛這味」。

### 嚴肅地玩遊戲

2016 年 2 月 18 日，美國 Towson University 的人類學系教職員玩著 Cards Against Anthropology，慶祝世界人類學日。這套遊戲始自 2014 年同系的 Matthew Durlington 教授在春季人類學理論課堂上與學生一起腦力激盪、討論如何用遊戲教人類學理論。當時的學生 Maya Mehta 提出參考 Cards Against Humanity 這套充滿下流語彙、令人臉紅心跳、在美國大學生之間高人氣的派對用卡牌遊戲，來製作一套人類學的遊戲。畢竟，人類學家在做田野時遭遇的難題與窘境也不亞於卡牌遊戲上的極端情境，而處理這些情境的成敗也會導致田野的成敗，並且往往是民族誌中令讀者會心一笑的部分，「那何不將那些令人不適的

困境或對話化成遊戲內容呢？」(Durlington 2017)。於是他和修課學生共作卡片內容，並在 2015 年在丹佛舉辦的美國人類學年會上發表、試玩。這個遊戲也因此擴散開來，廣受美國各大學的教授採納成為教材，甚至被翻譯成法文版。 [1]

**熱情，不只是翻譯：**

### 從 Cards Against Anthropology 到「卡到人類學」

不過如果只將卡牌直接搬到台灣的課堂上使用，不只親近感不足，甚至可能變成查英文字典比賽。想引介這套遊戲進入台灣、進入中文世界，翻譯勢不可免。但一匹狼的的翻譯恐怕會無疾而終，於是趁著 2021 年全球疫情肆虐、無法入境田野地的待機期間，我與陳玉苹、卓浩右和鄭建文，組成中譯計劃小組，活用大家的教學與田野經驗，進行了數次線上討論、翻譯、潤飾、編輯、擴充與製檔。隨後就是到各課堂試玩，聽取主要受眾大學生的意見，進行調整與修改。期間，我也去信告知原作者之一的 Durlington 教授徵詢其同意，他表示樂見其成（「That is so awesome」），也提出有餘裕的話多照一點成品和活動的照片上傳到推特 (twitter) 並標籤 @anthrocards。

在分工初步將卡牌由英文翻成中文之後，小組透過線上會議，朗讀每一張卡片，修正英式中文、潤飾文字。小組成員琢磨再三的地方，包括從該怎麼精確翻譯「break up」或「take it」，到生難詞如「gentrification」是否該另行解釋，再到該怎麼處理原版卡牌中多次使用「informant」這個指稱田野中的研究對象但因為具有不對等意涵目前已經盡量不使用的詞彙 [2]，都是文化轉譯的幽微之處。另外，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中也對原版的卡牌以拉丁美洲各國的田野例子為主、卻沒有一張卡片提到美國，是否過於侷限或者陷入凝視他者的研究者本位等問題感到質疑。因此，加上了美國，也帶入亞洲的例子。除此之外，小組也決定增加些許符合當代田野情境的題目卡，以及帶有滿滿臺灣味和流行用語的答案卡，增加可玩性。例如「你的田野地因為疫情的關係突然決定要封城了，你的研究正進行到一半。你怎麼辦？」的題目卡，和「切八段」、「先喝口水壓壓驚」的答案卡。

Cards Against Anthropology 的中文命名也稍微讓我踟躕了一番。英文是直接置換鼎鼎有名的 Cards Against Humanity 中的最後一個字為 Anthropology 而成，望文生義、簡單明瞭，一看即知就是 Cards Against Humanity 的人類學版。然而中文直譯就會少了點味道。腦

內排列組合了「毀滅人類學卡牌」、「泯滅人類學卡牌」、「反人類學卡牌」…等等，都略顯冗長，沒有原文來得有意思。幾度輾轉反側後，想到將名詞「卡」動詞化，除了有令人聯想到「卡到陰」的黑色幽默，也把原名的 against 的叛逆意思包含在內了，於焉產生了「卡到人類學」中文名稱。

### 玩得像人類學家一樣

簡而言之，「卡到人類學」是一款透過「黑色題目卡」提供情境，讓玩家有機會站在人類學家的立場思考，搭配上充滿惡趣味且荒謬的「白色答案卡」，讓玩家得以享受遊戲的樂趣。



「卡到人類學」的黑色題目卡與白色答案卡  
(給使用者的溫馨小提醒:卡牌裁剪過程相當費時,請務必提早進行)

### 遊戲建議 3～5 人一組，規則如下：

1. 每位玩家先抽五張白卡作為手牌，將剩餘的白卡和黑卡文字面朝下、分別疊放於玩家中間。
  2. 每位玩家輪流做莊。輪到做莊的人抽出一張黑卡，把卡上的句子大聲唸出來。
  3. 其他玩家挑出自己手上的一張白卡，文字面朝下交給莊家。
  4. 莊家將收到的白卡洗牌後，一一唸出，並選擇最佳答案。誰的答案最受莊家喜愛（/ 最有創意 / 最搞笑 / 最糟糕 / 最無厘頭 ... 都可以。莊家有權自己決定），誰就贏得該回合。贏家收下黑卡。
  5. 除了莊家之外，每位玩家從中間的白卡堆補充一張白卡。
  6. 繼續下一回合，由另一位玩家做莊。遊戲結束前，每位玩家做莊的次數相同。
  7. 由獲得最多黑卡的玩家贏得比賽。
- 遊戲一輪短則 15 分鐘、長則 30 分鐘。

然而，遊戲結束之後，重要的部分才真正開始。玩家 / 學生已經透過黑卡看見了各式各樣人類學家可能遭遇的倫理困境，但是授課教師該如何引導學生進入研究倫理的討論、搭配何種指定讀本和設計學習單，就各憑需求和創意了。

我個人的作法是參考網路上的美國和臺灣的人類學年會倫理規範 [3]、Thinking Anthropologically(2008) 第 8 章 "Thinking and Acting Ethically in Anthropology"，以及 My Freshman Year — What a

Professor Learned by Becoming a Student (2006)，製作 PowerPoint 投影片，在玩遊戲前，先大致講解研究倫理的淵源和與研究倫理相關的 20 個關鍵字，例如知情同意、責任衝突、視覺倫理等等。待遊戲結束後，請贏家挑選或者組員共識決，挑出最有印象的兩張黑卡，進行小組討論：「請用思考人類學倫理的角度來討論。如果你真的碰到黑卡中描述的狀況，你會做何選擇？為什麼？請至少使用一個關鍵字來解釋你的選擇」。之後請小組派代表闡述針對困境做出的選擇（或不選擇）與思考路徑。

第一次在臺灣帶領大學生試玩「卡到人類學」，是在逢甲大學文化與社會創新碩士學位學程的「從人類學看世界」的課堂上。在帶領學生試玩之後，授課教師陳玉苹觀察到「卡到人類學」特有的荒謬喜感的情境設計往往能吸引學生注意。在「這些答案好巧一尤」的驚呼下，尚未有田野經驗的大學生也能在玩完遊戲後開始思考田野工作的複雜倫理情境。

之後，承蒙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文化人類學」何撒娜老師與同學、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文化理論」李宜澤老師與同學、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張正衡老師與同學、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Anthropological Field Methods」陳如珍老師與同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文化人類學通識課程」的鄭建文老師與同學願意給予機會，共六次的試玩 [4]，讓卡到人類學中譯計劃小組獲得真實的第一手使用者心得和寶貴的修改意見。

前四次是我親自到各課堂現場帶著玩，看見玩家對倫理困境的好奇、激辯與反思。第五次我雖然未能到場，但是根據授課教師陳如珍老師的試玩教學心得，學生玩起來放鬆了身體，開始相互揶揄與激辯，他們透過卡牌中田野合作者反悔的情境，理解到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所需要的相互尊重與不斷協商，也從與藥物成癮相關的情境，看見自我對於法律和人類學倫理的掙扎。



課堂上試玩「卡到人類學」(陳玉苹授權)

## 奉上卡牌，結束這一回合

目前「卡到人類學」卡牌遊戲已經全數上傳到臺灣社交媒體使用率第一的臉書 (Facebook) 的同名粉絲專頁上 [5]，包含「使用說明書」、「題目卡」、「答案卡」、「遊戲規則」與「學習單」。當初選擇這款遊戲推廣的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因為它能減低教學資源差距的可近性——只要有印表機和剪裁卡牌的勞動力、耐心與時間，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使用這款卡牌開玩！

從 Cards Against Humanity、Cards Against Anthropology 到「卡到人類學」，都是開放大家免費自由下載遊玩，僅要求遵守創用 CC 授權原則 [6]，希望能夠最大限度地增加流通率，方便眾人使用與推廣。我們也設計了幾張「空白卡」，讓玩家能自由增添卡牌，畢竟，田野是多變的，每位人類學者的遭遇都不同，隨著時代應運而生的倫理困境也不盡相同，希望透過眾志成城無限擴充卡牌，玩家能夠有更多案例來思考「你怎麼辦？」

---

[1] "Towson students, professor develop "Cards Against Anthropology" " <https://thetowerlight.com/students-prof-develop-cards-against-anthropology/>

[2] 「gentrification」直接翻譯成「仕紳化」會不會太難懂造成玩牌障礙？最後我們決定保留原汁原味，增加在教學使用上學生提問和教學者互動的機會；「informant」該翻譯成「報導人」、「合作者」或「對話者」？最後我們決定交替使用「報導人」和「合作者」，增加教學使用上可以帶入討論的選項

[3] 美國人類學會倫理規範 (Statement of Ethics) <https://ethics.americananthro.org/category/statement/>。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倫理規範 <http://www.taiwananthro.org.tw/5b788853502b7406/81fa70634e6a985e5b7882076c1165cf5b785b786703502b7406898f7bc4>

[4] 各堂課的使用心得文與照片，可以在卡到人類學的粉絲頁面上看到。或者搜尋 #anthrocards, #卡到人類學, #卡到人類學中譯計畫小組, #CardsAgainstAnthropology, #CardsAgainstAnthropologyInMandarin

[5] 「卡到人類學」  
<https://www.facebook.com/CardsAgainstAnthropologyTW>

[6] 創用 CC 是什麼？ <http://creativecommons.tw/expl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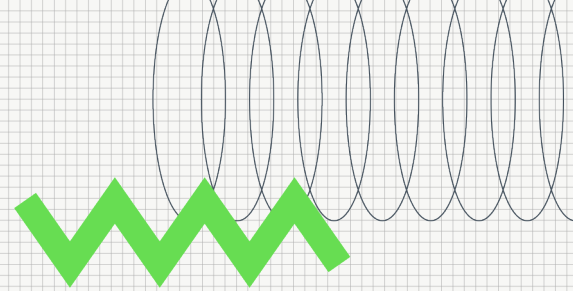
## 參考書目

Durington, Matthew. 2017. "Teaching Somewhat Serious Games." In *Gaming Anthropology: A Sourcebook from #AnthropologyCon*, edited by S. G. Collins, J. Dumit, M. Durington, E. Gonzalez-Tennant, K. Harper, M. Lorenc, N. Mizer, and A. Salter, 22-25.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anthropologyconorg.files.wordpress.com/2017/12/gaming-anthropology.pdf>

Kingslover, Ann. 2008. "8. Thinking and Acting Ethically in Anthropology". In *Thinking Anthropologically: A Practical Guide for Students*, edited by Philip Carl Salzman and Patricia C. Rice, 68-75.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Nathan, Rebekah. 2006. *My Freshman Year: What a Professor Learned by Becoming a Student*. New York: Penguin Press.





## 社群記 / 紀事



# 好奇且易感的文化追尋者—— 胡台麗教授追思會側記

鄭瑋寧



胡台麗教授的田野身影（李赫先生授權使用）

2022年6月14日在陽光熠熠的華山1914文化創意園區，舉辦了胡台麗教授的追思會。根據胡教授愛子李赫先生表示，那是他母親生前最愛造訪、看展覽的場所。

在會場報到處對面，除了持續播映胡教授生活照的電視螢幕，更以原木架設了一座雙面柔白帷幕，印製了胡教授對人、土地與文化的所思與感懷之字句。帷幕後方的空

間，有兩座平面展示櫃擺放她遊歷多國與田野工作所蒐羅的物件，另一側的珍珠板則有胡教授在不同年歲時所留下的田野身影。

通過那個為了蔡英文總統蒞臨而設置的安檢關卡，即可見一處允許來賓鮮花叩唁胡教授的角落：沿著牆邊有著各類白色花朵，另有滿裝了玉蘭花的磁盤（據說那香氣深為她與婆婆所喜），牆上掛著胡教授的夫婿李惠正教授的墨跡「永遠的田野」，胡教授等身大的半身照片被白、綠色系的花葉所裝飾。而照片的前方除了高低有致的白蠟燭和供緬懷者獻上鮮花的透明玻璃瓶，更有總統府資政孫大川的姊姊當天早上從台東空運送達的花環。

司儀宣讀總統褒揚令上的文字，為追思會揭開序幕。褒揚令譽讚胡教授對台灣農村社會與榮民議題研究的投入，以及探究部落祭儀樂舞與巫師祖靈的文化涵義等方面的貢獻。特別是她投身民族誌影片拍攝，體現動態觀點對

話，如《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五年祭》、《矮人祭之歌》、《蘭嶼觀點》等作品，屢獲國內外獎項及展演邀約，堪為本土相關紀錄片先驅與奠基者，並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殊榮。因此，「綜其生平，盡瘁臺灣文化保存復振，標揚國家多元族群融合」。讀畢，由蔡英文總統親頒褒揚令。



追思會現場一隅（郭佩宜博士授權使用）

胡教授畢生所拍攝的民族誌影片經由民族誌影像學會的剪輯、串連，展現出她對台灣的深情。中央研究院廖俊智院長提到，胡教授的影像人類學研究在中央研究院獨樹一格，且是目前唯一拿過金馬獎的研究人員，其作品不僅榮獲國內外各項殊榮，更有助於台灣社會能夠認識原住民文化的珍貴，她畢生提倡入世的人類學，希望透過人類學研究來讓原住民文化發揚光大。同時，胡教授任職所長期間，提倡博物館與部落的共作展，重新定義人與物的關係。他更憶及2020年8月前往屏東佳平部落參加共作展開幕活動，胡教授展現了爽朗與親和。在她所有作品中，《讓靈魂回家》與中研院關係最為密切，該片紀錄了阿美族大巴壠部落一幢古老家屋在1958年因颱風受損，該家屋的七根雕刻木柱經過族人同意，收藏於民族所並展示。五十多年後，前來觀看雕刻木柱的巫師感應到祖靈仍在其上，希望文物能返鄉。最後經過一番討論，族人決定只帶祖靈回家，將木雕留在民族所，日後讓更多人前來觀賞、認識。

中研院民族所張珣所長對胡教授在機構與學術發展的貢獻，娓娓道來。胡教授是民族所的第九任所長，為後來的所務發展。在任職所長期間，胡教授舉辦了民族所

六十週年所慶，並為影響台灣人類學發展的前所長李亦園院士舉行了隆重的告別式。在民族所這個台灣戰後擁有最多原住民歷史文獻、物質文物與影音資料的機構中，這些物質與影音資料長期被視為是對文字記錄與研究書寫的佐證。不過，1980年代胡前所長在紐約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時，接觸到視覺人類學，返台後獨自摸索，並以簡單機器設備拍攝民族誌紀錄片。在當時研究蘭嶼達悟族的專家劉斌雄所長任內，胡教授與劉前所長開始合作記錄原住民歌舞祭儀，長達數年之久。這次合作更讓胡教授從閩南農村經濟變遷的研究，轉向關注原住民祭儀歌舞文化的保存。有別於先前以文字為載體的研究習慣，胡教授開啟了以影像來捕捉、保存並記錄原住民族歌舞祭儀的研究途徑，讓圖像從文字之輔佐角色，躍升為主角。在影像成為國際人類學界的發表媒介之後，胡前所長更於2000年成立台灣民族誌影像學會，兩年舉行一次民族誌國際影展，於全台巡迴、講評，引領諸多後輩投身該領域。此外，近數十年來的解殖民潮流引起了對文物返鄉的熱議，民族所博物館在歷屆館主任與胡前所長策劃之下，與部落或團體合作共作展，擇定一主題來對不同標的文物進行策展，讓文物與耆老重逢，並傳承古老智慧與情感。過去幾年在苗栗

泰安、宜蘭南澳泰雅部落與佳平排灣部落進行的共作展，讓文物成為回溯過去知識與技術，尋找過往生活智慧，成為建構傳統知識體系的一環。田野經驗豐富的胡前所長為台灣原住民祭儀文化留下豐碩成果，而對雲遊四海的念想，說明了她那不受羈絆的心。

原住民委員會主委夷將·拔路兒述及曾在不同部落巧遇胡教授認真進行田野工作的景況，更親自造訪希望原民會能增加對民族誌影展的補助。他特別提到小學教科書所描述的吳鳳的故事，讓他感到羞愧，小心地隱藏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大學時因為閱讀了胡教授所寫的〈吳鳳之死〉（1980），決定與數名在台大就讀的族人一起前往阿里山鄉，聽族人講述與吳鳳的互動，印證了胡教授的說法。這促使他與族人在1987年前往嘉義火車站發動抗爭，拉下吳鳳銅像。之後他們向當時的教育部長陳情，要求教科書撤掉吳鳳的故事；胡教授更參加相關的座談會，予以支持。對他而言，研究者從原住民的史觀所進行的論述，不僅有助於原民認同的形塑，甚至促使了吳鳳鄉改名阿里山鄉。為表彰胡教授對原住民文化的貢獻，主委頒贈一等原住民專業獎章。

在胡教授熟識的部落族人進行追思之間，尚有數名立法委員的致詞：黃國書委員憶及在北藝大曾修習胡教授開設的文化人類學課程，在親和與優雅中，讓他有機會認識並關懷台灣這塊土地上人、文化與社會；高金素梅委員則呼籲現場原住民朋友展現族群尊嚴並重視文化價值，以發揚胡教授的精神；孔文吉委員則提及當年出版第一本書時商請胡教授寫序，她爽快答應的往事。孫大川資政指出，他認為 1980 年代原住民在台灣民主化過程所能提出的議程，可分法政與文化兩條路線，他認為後者不必仰賴權力，且攸關原住民文化認同的存續，特別是消化過去人類學的研究成果來新創文獻。胡教授長年記錄的祭儀影音資料，提供原住民得以追溯祖先容顏的資產，讓原住民從中尋找自己想要形塑的自己，以能動性面向未來持續創造。

在部落族人的緬懷追思中，由胡教授協助創立的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的創始成員斯乃決與懷劭、法努司等人，吟唱卑南族〈懷念年祭〉來紀念創團以來的情誼，並提到「年祭」是當初他們慎重考慮她的建議後才確定的中文譯詞。

追思會主持人的丹耐夫·正若則以排灣鼻笛演奏胡教授每日聆聽的三地門古謠〈Iuljimai〉，並將她的名字寫入歌詞，以吟唱追憶友誼。布農族人烏瑪芙巴刺拉蒂頌唱古謠〈忘不了你〉以誌紀念，而太巴壠部落 Kakitaan 家族的何玉蘭（Tipus）訴說與胡教授之間因為田野而生的姊妹情誼；阿道·巴辣夫·冉而山與懷劭、法努司一同以古謠告別。排灣詩人莫那能則以她生前所喜的詩〈相會〉來紀念胡教授對原住民運動與處境的支持，另一名排灣族人卓秋琴（Ivy）則與原舞者團員一同吟唱古樓思念曲來懷念她。達悟作家夏曼·藍波安則以三則小故事，追憶曾與胡教授因對未知的好奇與文化規範之間的遭逢景象而來的日常對話。最後，賽夏族人朱志敏（Obay）及其家人則以一首不會觸犯禁忌的古調，來紀念孩子們眼中永遠笑聲颯爽的姑姑，與同輩眼中勤奮的田野工作者。

在向前來悼念胡教授的來賓致意時，李赫先生提到母親是個可愛又任性的人，若她知道這場追思會動員了許多親人、朋友與母親同事的協助，肯定會責備他。她生病

的那六個月是兩人相處最為密集的時光，也讓他看到最真實的母親。對於病情的打擊和折磨，她未有一絲抱怨，因為母親只在感動時落淚，從不因傷心絕望而哭泣。在他眼中，母親永遠天真、勇敢且倔強，對美麗事物不吝讚嘆，對有趣與未知充滿好奇。籌備追思會的過程，他收到母親的朋友與同事的大力支持，希望母親會喜歡這個有著親人、同事與朋友相聚的午後。過去某些時候他曾以不了解母親的工作為榮，畢竟他與母親是兩個不同個體。但是在試圖拼湊母親的生命這個過程中，若非民族所所長、兩位副所長以及同事的幫忙，這些準備工作將難以完滿。另外，他也感謝平日一起工作的夥伴不計辛勞與代價的付出，相信母親會為他的幸運感到欣慰。在所有人心目中，母親的模樣永遠充滿活力，永遠不老。在得知自己生病時，母親曾傳訊息給他，說她人生活到七十多歲，算得上豐富幸福，已滿足；

若再有一年半載，她將可計畫完成某些事情。儘管她未能如願，但也許沒有遺憾的人生，並不算真切地活過吧！「我母親的名字叫台麗，她是真心熱愛在這個島嶼上所有生活過與存在的人與文化。雖然在我心中，她只是一個平凡、充實過好每一天的人，但她對台灣的意義可能比我想像的大那麼一些些。再次謝謝所有到場的貴賓，每一個在台上、台下與線上懷念母親的人，相信母親一定會感受到各位深深的情感和思念。父親是個質樸低調的人，與我同樣不習慣面對群眾講話，今天就由我代替父親與母親，向前來參與的各位致上謝意」。

最後，胡教授的家屬特地準備了禮物包括紀念文字集冊，筆記本與一只葉飾，致送與會來賓。離去前，數名到訪的親友與同事們分別與胡教授的相片，拍下最後一次的合照。

## 【學會訊息】

# 2022 年第五屆「李亦園先生紀念獎學金」得獎名單

本年度碩士論文獎項申請案共計 13 件，扣除 1 件申請資格不符之申請案，計有 12 件優秀論文進入第二階段的兩位專家外審。經由學會常務理事組成之決審會議，決議三名獲獎論文與兩名評審團特別獎。獲獎論文每名將頒發獎金新臺幣貳萬元及獎狀一紙。為獎掖優秀著作，今年特別設置評審團特別獎，頒發獎狀一紙。

### 一、「第五屆李亦園先生紀念獎學金」獲獎名單如下(不分名次,依照姓名筆畫順序):

#### (一) 李橋河(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

論文題目：《重現道地，上演可愛：臺灣品牌下婆姐藝陣的舞蹈景觀》

評語：本論文以兩個不同的婆姐陣作為比較基礎，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切入，進行比較。論文描繪「舞蹈景觀」，分別梳理道地性、風格形塑、身份認同三個面向，進行跨文本的連結與論述，講究脈絡性語言文字。本文結合宗教陣頭與舞台表演兩種不同取向的分析方式，更精確掌握到「藝陣」這種二十一世紀台灣新文化現象的特質，從美學品味分析與「媒介」宗教與物質文化研究角度切入，同時也沒有忽略文化創作與國家的關係，從方法論、理論到現象，本文都是相當傑出的研究。



(二) 林岑 (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

論文題目：《樹豆知道：排灣族 vuvu 農地的混亂與共生》

評語：本論文從位於田地邊緣的樹豆，試圖由它的視角出發，追尋樹豆在西方農業科學知識生產、台灣當代飲食市場、vuvu 的混作田區，以及排灣族飲食與文化實踐中的種種身影。在地族人日常生活的傳統食物，食物／物質性所夾帶的社會連帶、交換與社會性，同樣是來自樹豆的視域延伸。由樹豆的邊緣位置，不只框架了世界，亦是本文章節安排以及內容鋪展的邏輯。這本論文行文流暢，層次分明，論點清楚且創意與趣味兼具，是一本優秀的論文。

(三) 馬振瀚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題目：《夾縫中的選擇：西安回坊與回族居民的認同建構》

評語：本論文研究中國西北回族穆斯林社群，討論陝西西安城中心區的回坊，少見且具有困難性。論文以近年來快速的都市更新計畫中所呈現的區域變遷現象為中心，觀察坊民的各種不同適應機制的開展與變化，來重新認定回民的自我認同意識的建構。從研究對象、研究設計到問題意識的鋪陳，到充分結合當代人類學相關理論，本論文確實掌握重點並發揮得很好。

## 二、「評審團特別獎」獲獎名單如下所列（不分名次，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一）柯哲瑜（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

論文題目：《實踐的 GAYA：水源文化健康站的太魯閣族文化照顧實作》

（二）羅盤針（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

論文題目：《跨入偽娘時空：北臺灣扮裝社群的性別越界》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籌辦之「第五屆李亦園先生紀念獎學金」頒獎儀式，已於「2022 年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年會」（9月24日與25日，國立中山大學）之「會員大會」（9月24日中午）舉行。